



2009年12月10日第28期

总第三十八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家庭专辑

故纸堆

[刘 涛 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节录）](#)

[康生盛赞 13 岁小女孩向父亲造反（节录）](#)

[郭苏扬 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前进（节录）](#)

[作家欧阳山之子在批斗欧阳山大会上发言（节录）](#)

[一封家信](#)

[一封控告信](#)

文摘

[老 鬼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革命](#)

[陈凯歌 在十四岁时背叛父亲](#)

乱世民情

[严欣久 作家严文井五七干校家书一束](#)

[姜东平 在“清队”风暴中倾覆的家庭小舟](#)

闲读偶记

[何 蜀 文革中的家庭关系值得好好研究](#)

编读往来

[1、杜钧福来信谈本刊质量](#) [2、丁凯文为上期文章提供视频佐证](#)

[3、于鹏飞来信更正](#) [4、蓝岭来信谈于鹏飞文中一个细节](#)

[5、裘贞就余汝信文中的语气提出商榷](#) [6、司马清扬对上期文章作两处修订](#)

【故纸堆】

按：刘涛是刘少奇和前妻王前的女儿，196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爆发时为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生。王光美是她的继母。文革开始后，刘涛在清华大学担任了红卫兵和文革筹委会等领导职务。1966年8月21日，刘涛在清华大学贴出经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修改的大字报《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年底，江青到清华园单独约见刘涛，代表“毛伯伯”表示对她的关心，提出“到底是跟毛伯伯干革命呢，还是当你父母的孝子贤孙，当反革命呢？”并建议她去找生母王前了解刘少奇的情况，“共同揭发”。12月28日，刘涛写出了这一长篇大字报。1967年1月1日，刘涛与弟弟刘允真访问生母王前以后，于1月3日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职工食堂等地同时贴出一式三份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7月22日，刘涛与王前、刘允真联名写出《坚决支持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由刘涛与刘允真送到中南海外“揪刘火线”。

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的初步检查（节录）

刘 涛

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注：指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杆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地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问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际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



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左图：文革前夕王光美〔中〕和女儿们。左起：刘亭亭、刘爱琴、小小、刘涛、刘平平。）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 and 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

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注：指刘少奇）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注：指王光美）回去过（注：指回清华大学去）。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像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注：指要她辞去在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中担任的领导职务），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

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注：李井泉之子）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注：指毛泽东）是如何对待父亲（注：指刘涛他们的父亲刘少奇）。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

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碰见她，我说：叶林（注：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注：指刘涛8月21日在清华大学贴出，经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修改的大字报《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

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在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着我妹妹保他们，我真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像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

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着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定反动路线。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确实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着。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1966.12.28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6年12月31日

【故纸堆】

按：此文摘自康生 1966 年 11 月 15 日夜在乌鲁木齐某宾馆接见新疆“红二司”代表时的讲话。他此次是率中共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建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途经乌鲁木齐。文中括号里的话是“红二司”同学或代表团成员的插话。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他盛赞的这个小女孩叫郭苏扬。

康生盛赞 13 岁小女孩向父亲造反（节录）

《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同学：十月六日）有个小孩讲，（同学：十三岁，扬州人。伍修权：对！十三岁，扬州人。）那个小孩相当沉着，（笑）她讲了，她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父亲不赞成。我就问她了，我说你兄弟、姊妹几个？她说四个。我问她了，你是老几？她说老二。我说是不是你母亲喜欢老大，或者喜欢老四，她不喜欢你？她说不是。她父亲——（同学：监委的，是监委）对，是督察委员。那个扬州的地委书记对文化大革命是有抵触的，她父亲是跟着跑的，所以我就反问一句。那么她就接着讲了。“你过去是革命的，我赞成；你现在不革命了，我就反对！”（热烈鼓掌）这个十三岁的小孩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可见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心了。我就问她，是不是他不喜欢你呢？她说不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她说我们的观点不同！（笑）哈哈！她和我谈了话以后，这个小孩就把她这个毛主席纪念章给我戴上，戴到现在（指胸前的纪念章），我还戴着出国串联呢！（笑，掌声）

原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本篇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故纸堆】

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前进（节录）

郭苏扬

敬爱的首长、红卫兵同志们：

首先，让我代表扬州市全体革命人民、革命师生，敬祝我们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满面红光，望着我们微笑，把无限希望寄托在我们青少年身上。

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回想上北京前艰苦奋斗的情况，我流下了眼泪……

八月二十五日，我报名参加了红卫兵，我就决心当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小兵。

正当我们江苏省扬州市各大中院校（注：原文如此）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的时候，扬州地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吓慌了，他们要尽各种手段，挑动不明真相的工农群众斗学生，颠倒黑白，打击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蒙混过关。

我父亲是扬州市委监察委员。由于我站在反对扬州地委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边，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压制我革命。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我爸爸对我进行了审讯，说我是“右派”、“反革命”、“反党黑帮”，说我“卖命为右派办事，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我说，对！我就是卖命为革命事业办事，充当革命的急先锋！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我想，干革命，就不免要受挫折，遭阻拦。现在关键的关键就在于自己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站稳立场，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只要有毛泽东思想，刀山也敢上，火海也敢闯！我这时浑身是劲，昂着头，挺着胸，我爸爸要我坦白交待，我坚决不承认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爸爸气得暴跳如雷，上来就给我两个巴掌，打得我脸上直发火，但我一直昂着头，他又用权棍打我，我趁机跑了出来。

怎么办？是坚持战斗还是退却？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感到毛主席就在我身边，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孩子，坚强些，勇敢地战斗！”我今年虽然才十三岁，读初中一年级，但想到毛主席，我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我腰杆子更硬了，有党和毛主席在撑腰，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妈妈无理地将我从学校拉回去了。他们用脱离父女关系威胁我，用没吃没穿吓唬我，用人情母爱软化我，并强行把我关在家里三天。这三天，大门不让出，同学不准来，使我和同学失去了联系。但是，木门关不住我革命的心！我反复学习毛主席语录、十六条和《人民日报》社论，越学越觉得党的英明伟大，越学越觉得没错！我觉得要革命，就得天不怕，地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戴高帽子不怕，舍得一身剐，坚决把资产阶级保皇党拉下马！

什么“脱离关系”，什么“永远不要回来”，什么爹娘，什么人情，都拦不住我！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哪有劳动人民的今天！有人说什么：你父亲是老革命，反不得！我认为：你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昨天是革命派，你今天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派！你今天反革命了，我就得起来造你的反！

十九日凌晨，我们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毛主席身边，我父母在家大肆造谣，说我上北京是被绑架来的，说我写的揭发文章是大学高材生写的，并勒令我校筹委会十月一日之前把我找回扬州，不让我见毛主席。面对这些，我毫不畏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让他造谣吧，让他攻击吧，真正的革命者是攻不倒，打不垮的！

（下略）

摘自东方红农业大学（原苏北农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东方红战报》第94期，1967年10月6日出版。原文副题为“革命小将郭苏扬在1966年10月6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发言”。

【故纸堆】

[作家欧阳山之子在批斗欧阳山大会上发言](#)

按：欧阳山，著名作家，文革爆发时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广东省文联主席。其歌颂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一代风流》第一、二卷）在文革爆发前即已遭到批判。196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由陶铸主持召开中南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会后根据广东省委文革小组部署，文艺方面公开批判两个作家（秦牧、欧阳山）和两部电影（《逆风千里》、《齐王求将》）；文学方面重点查《三家巷》问题和“精神贵族”问题。8月30日，欧阳山被抄家。

本篇摘自1966年10月11日广州《红卫报》（即原《羊城晚报》，“破四旧”时更名）报道，原标题为《红卫兵、革命学生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同仇敌忾/广州五千人集会斗争反党分子欧阳山》。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从报道可知，这个大会是由官方而非造反派组织的，欧阳山是否被押到会上接受批斗，报道中没有提及。从大会居然动员了欧阳山的儿子及曾在欧阳山家工作过的厨师和保姆登台揭发批判，可见大会组织者颇具匠心。当后来造反派批斗“走资派”也如法炮制时，不知那些动员儿子揭发父亲的“始作俑者”作何感想？

本报讯 广州地区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学生和广东省文化艺术界革命同志，以及首都大专院校到广州进行革命串连的红卫兵、革命学生等约五千人，九日举行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欧阳山大会。到会的革命同志，同仇敌忾，参加斗争。

大会在全场庄严地朗读了毛主席语录后开始。在大会上，广东文化艺术界革命同志五人先后发言。他们以无比的愤怒，历数欧阳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罪行……

欧阳山的儿子向东生（原名欧阳燕星，广州市十六中学学生）也参加了大会。他一登上讲台，就怀着无法抑制的极大义愤高呼：“打倒欧阳山！”“彻底清算反

党分子欧阳山的罪行！”他列举事实，揭露欧阳山公开污蔑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说“大跃进搞了”，“得不偿失”，是“用空想代替现实”等反党谬论，并收藏了一封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黑信。向东生还揭露欧阳山污蔑革命现代戏，诋毁一九六四年报刊上对他的大毒草《三家巷》、《苦斗》的批判，指出直到最近，他还叫嚷说：“就是一百年以后，我也不承认。”真是嚣张之极！反动之极！

中山大学一位革命学生着重批判了欧阳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箭：短篇小说《金牛和笑女》……

广州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市郊前进公社江山大队叶彩金，以无比义愤控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欧阳山及他的“作品”毒害青年的罪行。

音协广东分会革命职工代表，以及曾经在欧阳山家里工作过的厨师和保姆的代表，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欧阳山这个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丑恶嘴脸……

来广州进行革命串连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无比愤慨地登台发言……

中共广东省委负责同志尹林平参加了这个斗争大会并讲了话。

在这次大会上，还有工人、革命学生和文艺界革命同志十人作了书面发言。

大会在全场热烈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声中胜利结束。

【故纸堆】

文革初期，当一些青少年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时候，其父母往往担心出现“反右派”运动那样的结果而加以阻拦，而一些领导人也以向父母施加压力的方法来阻止青少年的“造反”活动，在许多地方都造成了家庭冲突。这份油印传单对此有所反映。标题是原有的。原标题前另有一行文字：“同志，你看了这封信后请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

一封家信

爸爸、妈妈：

你们好！昨天你们到学校来，说学校把我们定成反革命，参加了反革命右派组织，干了反党的勾当。你们劝我洗手不干，不要忘本。爸爸妈妈，你们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忍着快掉下来的眼泪，千言万语，但是嗓子噎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们一怒之下说：“你今后别再回我家了！”

爸爸妈妈，是党和毛主席把咱们从资本家的皮鞭下解放出来，我知道你们对党对毛主席是无限的热爱，我还记得你们讲起那苦难的旧社会的事情，总是挥动着结了老茧的手，紧握拳头说：“共产党是咱命根子，谁要敢动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根毫毛，我就跟他们拚命。”现在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何况儿真是反革命，是右派，不要说断绝关系，就是把儿打死也是应该的。但是，儿并没有反党啊！我的骨头是共产党的骨头，我的血管里流着工人阶级的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儿最听得进去，做得出来。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就决心把学校里、市里、省里、全国，以至全世界的牛鬼蛇神一齐揪出来，扫干净。我们大鸣大放，大辩论，写大字报，所有的妖魔鬼怪，都怕得要死。你们不是要我时刻不忘党的教导吗？我正是按十六条做的呀！

儿反复的学习十六条，觉得儿没有做错。我给坏蛋贴了大字报，使他们慌了，就到家里去造谣言。爸爸妈妈，那些家伙跟党早就两条心了！跟毛主席早就两条心了！他们是挂着党的牌子的地主、老财、资本家！你们千万不要被他们迷惑了啊！让弟弟忠军给你们念十六条的第二条和第七条，你们就明白了。他们使用手法，使你们把我们赶出了家门，他们的造谣使好多同学和家里断绝了关系，他们使用手法，把我们同学家长的工资扣掉，甚至开除公职，他们这些卑鄙的伎俩要让人们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我更加相信真理在我们这边。

爸爸妈妈，我们现在身上虽没钱没粮，但是我怀里揣着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累了，饿了，渴了，翻开第一页，端详着毛主席的相片干革命，毛主席在向我微笑，顿时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什么全忘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跟着毛主席永远干革命”，我虽然累死、饿死，也不向黑帮低头！黄继光、江姐是我的榜样！我们虽然没有红袖章，但是我们还是组织起了红卫兵，我们红五类子女抱成一团，力量就更大了。我们想胜利一定很快到来，那些黑帮挣扎不了许久了！好吧，爸爸妈妈，就谈到这儿吧。胜利那天再向你们问好！

祝
学习十六条，捍卫十六条！

抗大路半工半读民办中学 儿 忠党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串联队印，重庆建筑工学院八一八战斗团、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泸州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铁骑战斗队、泸州师范“一〇·一六”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翻印。1966.10.20

【故纸堆】

一封控告信

按：此文的原件是一封写在公笺上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女性，信的内容是揭发她原做临时工时的工厂支部书记在文革前利用职权，对她进行威胁利诱，与之发生性关系。文革中，她在造反派的鼓动下，揭发了这个当权派，却落了个夫离子亡的结果。此原件由瑞典文革史家沈迈克教授多年前从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购得，数月前扫描惠寄本刊。对沈先生的热忱相助，本刊谨此致谢。

控告×××破坏我家庭的罪状

我是1965年十月份由私人介绍到汽车运输保养厂干合同工。当时本厂负责人、当权派书记——×××。他以书记为名，特别对我关心，经常问长问短，对我很客气，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几个人，爱人在哪里工作等等。在工资方面，他利用职权想把工资定为三级。当时我们组长N同志说小S只能按二级工资，合同工不能超过本厂职工，否则大家有意见。但是他不听。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呢？原来他是有目的想达到自己的流氓活动。我一天晚上，我一人在宿舍泡脚，他进去，起先坐在床上，以关心的态度，又来问家庭、工作等问题，后来

跟我拉拉扯扯，当时我心里很害怕，就对他说，你不要动手动脚，我是有夫之妇的人，不能这样做。他就以书记的权力来吓唬我，说什么你是合同工，你不跟我搞，我有权，不要你，工资不替你开等等的言语来威胁我。我当时心里又害怕又不敢得罪他。当时我年轻无主张，经他一会哄、一会吓的就这样被他强迫发生了一次关系。他见我心神紧张，他又来吓唬我说，你要讲出去，工作就叫你回家，你爱人也不要你，跟你离婚。我被他这样一吓，第二天我也不敢和别的领导谈。

从此以后心里总好像作了一件亏心事一样，对不起领导和我丈夫。文化大革命开始，Z师傅是造反派头头，问了我，我把情况和他讲了。68年3月份我爱人知道了这件事，就到保养厂去了解，领导为了我们家庭关系好，也没有说什么。在6月份请假到我爱人那儿去。我几个月就没有回来，到8月份回来，领导说你是临时工，假也办好。后来我就在家，我爱人看我也没有工作。再加这一件事，我爱人气上加气。我爱人生气，写了两封信，给我父亲和姑父，我父亲一气之下，自杀死去。造成娘家生活艰苦，爱人与我分居，把婆婆与我分离，不久也死去。让我一人带着瘦弱多病可怜孩子生活。就靠我爱人寄一点钱，有时十元，有时七元等等。有时靠居民补助一点，过着困苦的生活，小孩多病，我爱人也不管，现在儿童医院二十多元。由于党对我们家庭的关心和照顾，我爱人从外地调到本市×××厂工作。他不但不回来家，而且还不管我们的生活，他的亲生儿子他都不管，现在搞得我大脑神经迟锐，学习工作都不安心，造成爱人与我要离婚。都是×××害的，害得我家破人亡、家庭破裂。心里越想越恨，这个流氓分子。要求厂领导对流氓分子严加惩办，严肃处理，否则我的难解我心头之恨。感谢公检法和厂领导速办。

此致
敬礼。

控告人 SXY

【文摘】

按：女作家杨沫，是“红色经典”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文革中杨沫及其小说也遭到批判。其子小波（“老鬼”是他后来写作时的笔名）为了表现“革命”，采取了抄母亲的家的行动……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革命

老 鬼

1967年，当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一批批判杨沫的大字报时，流言纷纷，妈妈呀，我非但没有安慰你一句，反而自己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的家。我恨你写了那部温情脉脉的书（注：指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恶心巴叉，使我面无光彩。里面没有军人，没有战火，只有一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朝的经费。

铁血精神淹没了一切，无毒不丈夫。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

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

杨沫必须低头认罪！

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

打倒臭文人杨沫！

红卫兵万岁！

……

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电话给扔到了房顶，书柜里摆设的小猫小狗被踏瘪，雪花膏砸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儿的家砸个稀巴烂。

完后迅速撤离现场，直奔北京站。狂热的脑袋充满了世界革命、战斗、捐躯。妈妈死了，我绝不会哭，但在去凭祥的货车上，一想起自己将步荆轲后尘，一去不复返，铁了心到越南抗美援朝战场杀身成仁，却流了泪。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英雄气概迷昏了我的头。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

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

不管她有时是怎么抠门，脾气怎么坏，终归是把自己哺育大的母亲。

惭愧啊，当我沦为反革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坏蛋，纷纷划清界限，骂我，戒备着我，全团 3000 口子人几乎没一个敢理我……母亲，被我砸过、抢过、骂过的母亲啊，又悄悄为我四处奔波，求人，直至上书总理。许多年后，我找到了母亲给北京军区首长写的一封信的原文，抄录如下：

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同志：

你们好！有一点事情麻烦你们，请原谅！

我的小儿子林胡，1968 年高中毕业后，自动去了内蒙锡盟插队。后划归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六十一团。七零年由于该连开门整党，他给指导员提了一些意见，不久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团里即借口他和别人打架，突然把他戴上手铐囚禁起来。后发动群众揭发，给他凑了几条罪状，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几年来，这个孩子感到非常痛苦，决不承认他是反革命，一直没间断地向各级领导，直至中央反映他的问题，请求重新处理。

过去，因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并没有支持他，甚至不大理他。自林彪的问题被揭发后，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如他说毛泽东思想不能说是顶峰，即据此说他诬蔑毛主席）。他虽多次向上反映，但至今没有回音。这个孩子已被折磨得有些神经失常，前一个多月，忽然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越过风雪弥漫的茫茫大草原，想来北京上访。虽未跑成，被团里抓回，但根据他的精神状态，随时不知会出什么问题。又听说北京军区政治部也早已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兵团，但至今也没有任何效果。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又来麻烦你们，请你们能够迅速指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早点复查和解决林胡的政治问

题。

我们没有教育好孩子，使他犯了不少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许多麻烦。我们感到很惭愧，很痛心。现在又再次麻烦北京军区的首长同志，内心尤其不安。但为了孩子的一生，我只好又写信给你们，如有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杨沫 1973.2.1

妈说我精神失常不是事实，令我不舒服。但除此之外，这信还是使我感动。世界上只有母亲的心才能这样以德报怨，宽厚为怀。妈妈，你多好啊！

请原谅我吧，亲爱的妈妈！你心中的怨气如果没有撒完，等下次回京探亲时，再接着向我撒吧。

节录自老鬼长篇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
(<http://www.cnread.net>) 独家推出。本篇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文摘】

在十四岁时背叛父亲

陈凯歌

按：现在知道陈凯歌是著名电影导演的人们当中，也许有不少人不知道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曾经也是著名电影导演。文革风暴骤然降临时，少年凯歌被所受的革命教育和面临的革命形势逼着，做出了背叛自己父亲的行动。为此，他在回忆录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忏悔。他执导的那些电影大片也许在喧嚣一时之后就会被人们遗忘，但是他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忏悔将会长久地被人们记住，启发许

多人的思考。

1964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做母亲，颂扬它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无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惟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坠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崇高、正义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手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但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

事发生在 1966 年初春。

到了 5 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做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注：1966 年 6 月中旬，文化部文革领导小组将司局长以上及各单位领导干部、业务骨干 500 余人集中到北京西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集训班”，批判和交待问题，称之为文化部文革的“主攻战场”）。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却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 1939 年 19 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要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在那一个春夜做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人们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

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

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的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惨景呢？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同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现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仍然原始，在于它的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惟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留在这个社会中。……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拼命证明自己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生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并无心态上的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证明，我才是我。

节录自《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主编：季羨林，执行主编：牛汉、邓九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乱世民情】

作家严文井五七干校家书一束

严欣久

2008 年 7 月 20 日是父亲严文井离世 3 周年的日子，我写这篇小文纪念他。

2007 年的 7 月，我来到咸宁向阳湖。在咸宁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的陪同下，依次走过了“452”高地、十里长堤、红旗桥、五七桥、鲁家湾、韩家湾、王六咀、甘棠镇等地。寻觅着当年父辈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不禁感慨万千。因父亲严文井生前所谈干校生活甚少，我一直想探寻其中的奥秘，所以，从火车开出北京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试图捕捉父亲及中国作协大队人马赴向阳湖的心境。然而，时过境迁，这趟去向阳湖的感觉怎么看都更像是去旅游。舒适干净的卧铺车厢，舒舒服服地睡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武昌。通往咸宁的是宽敞平稳的高速公路，即使从咸宁通往向阳湖的道路也都是柏油路。只见浓烈的红土地掩映在苍翠的茅草与树荫下，沿途还有欧式的别墅。一条通往珠海的高速公路从绵延的绿丘间穿过，蜿蜒而去，为向阳湖平添了现代色彩。农舍院内架着白色的锅式天线，荷塘、稻田、竹林、桂树、青橘、芭蕉叶、葡萄藤、西瓜地、麻鸭、飞鸟……不时映入眼帘。除了潮闷的湿热让人感到不适外，这里简直可以用美丽、幽静、富庶来形容。

(右图：文革前全家最后一张合



影。后排：父亲严文井、母亲李叔华、哥哥严欣强；前排左起：二姐严南德、妹妹严欣成、严欣久、大姐严安思。)

最近，我找出当年父亲在干校时，给我这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儿的通信。信已不全，但仍能反映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的背景，及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心态。算是为向阳湖的研究提供些史料吧。

父亲去干校的前后

1969年9月，父亲去向阳湖的时候，我已早在一年前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那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美术的哥哥，刚于6月份去了甘肃黄羊滩当骑兵；当年的年底，妹妹又赴陕西插队（后又来到内蒙和我在一起）。我们兄妹走的时候，父亲尚关在“牛棚”里，没能为每个孩子送行。其实，他早就料到，他这个“走资派”早晚会被扫地出门，所以，早就让妈妈给我和妹妹都置备了厚厚的冬衣。妈妈表面上很坚强，心却已经被撕扯成几瓣。待最后，全家七口人七个地方时，她的心被完全扯碎了。尽管她在文革中并没受到冲击，但她无法忍受亲人分离的状况，郁郁成疾，没等到“四人帮”垮台就离开了我们。

父亲下干校前，妈妈给哥哥写了封长信，先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想复员回京的哥哥，不要脱下军装，最后向他述说了北京的情况：

……爸爸也要走了，他那个地方也不比哪里强，泥泞、水淹、蚊子、连阴天、潮湿……我们都这样大年纪了，我们都要去勇敢地迎接这一切。

最近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国庆前限制人员来京，对各地来京外调都得有省革委会负责同志的介绍信，来京时间也有限制，来京买车票也要有介绍信。小妹她们想回来，我估计不容易，所以劝她们不要回。现在常在半夜查户口，幸好小妹走了，要不真为难。你若能在国庆节前回来一次，在我和爸爸下去前大家谈一次当然很好，以后不知是否没病就不能回来？我们去汉沽（芦台），每月有两天假可以回京。再说二姐今年也不下去，北京若能给留两间房子，你们回来还是有地方住。

我们于七月初开始整党。我于八月二十三日作了斗私批修检查（每人都作了），已于八月二十六日恢复组织生活。我是第一批二十三个人恢复组织生活中的一个。从今我又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今后当个共产党员不容易，标准高，我自己要努力，也希望你们帮助我。二十六日晚恢复组织生活那次支部会，给我们二十三人每人发了一本红宝书（四卷袖珍本）、一本党章。你若要，我可以割爱。

爸爸已在机关大会检查过一次。上星期催他写出书面检查，为了上报，可能是快要解放他了。

他们机关可能要在9月20号左右去湖北咸宁。全机关都走。

我们大约要到10月4日走。夜深了，不写了。我还要修改斗私批修检查，近日一直很忙。快来信。

妈 1969、9、2

根据诗人郭小川日记的记载，父亲是1969年的7月17日开始做检查的。8月27日，他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共做了7次检查才获通过。实际上每次检查都是一次批判会。他是在做检查、挨批的紧锣密鼓中做去咸宁的准备的。当然比起受到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人来说，他就算幸运了。尽管受批判令人心悸，但毕竟是解放的前奏。1969年3月，自珍宝岛事件后，战备越来越紧。中国作协4月份开始派遣人员到咸宁打前站，为全机关“一窝端”下去作准备。清理有问题的人，也是下去前的准备工作之一。作协从3月20日起，开始依次让有问题的人做检查，先从中层干部做起。到4月份，便有人得到解放。从陈白尘的《牛棚日记》看，李季是作协领导干部中第一位获得解放的。郭小川虽然在4月底就被通知做检查，却是到咸宁半年多后，和父亲一起被宣布解放的。

我援引妈妈的信，还有一个原因，即这封信实际上也是父亲对母亲规劝的结果。当时妈妈很想跟父亲一道去咸宁，父亲坚决反对，不是他不想和母亲在一起，而是他知道像妈妈这样的北方人很难适应湖北的潮湿、闷热、泥泞、蚊咬，也很难适应下水田的重度劳动。另外妈妈见全家人将天各一方，赌气想把我们在东总

部胡同的房子退掉，父亲也没同意。

9月23日，离父亲去咸宁还有3天，妈妈托人给我和妹妹捎了些用的吃的，并在清单上附了简单几句话：“爸爸26号中午走，这两天我非常忙，今晚不能多写，以后过几天给你们寄几本书……我下月五号走。亲你们。妈9、23”。

父亲到干校时，仅跟妈妈一人保持联系。直到1970年6月25日，他获解放才开始跟我通信。他在干校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既欢喜又拘谨，一点不像他以往的文风。

欣久、小妹：

我已于昨天宣布解放，结论大意是：历史上没有问题，在作协犯了走资派错误。

这是我继续革命的新起点。我一定深刻吸取教训，彻底改造世界观，争取从思想上完全解放自己，我决心紧跟毛主席革命一辈子，为工农兵服务一辈子。

希望你们继续督促我，帮助我，我一定在今后半辈子为人民立新功。

最近我参加了伙房的工作，为期一个半月，忙得很，读报和写信的时间都找不到，过了这一阵可能要好些，那时再给你们多谈一些。

希望欣久能将到县里去讲用的情况告我一二。

爸：6月25日

我那时在农村干得不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知青集体，在别的知青点都纷纷分家分灶的时候，我们的集体仍很团结，还帮助村里破获了一起重大的盗粮案，成为村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被评为公社、县里的知青先进集体。我作为这个先进集体的代表曾于4月份到县里做了一次宣讲，这个消息对父母来说很是欣慰。所以父亲在把自己获得“解放”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同时，也希望我能把去县里讲用的情况告诉他。

我为爸爸获得“解放”而高兴，但我一点不知道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仍有那么多苦衷。请看杨匡满对父亲在干校生活的一段记述。

……不久，严文井和郭小川在同一天解放了，周围一些同志起哄，要他请客吃糖。严文井想到文革初不是批判他有架子，做官当老爷吗？那就借此机会同大家打成一片一起乐一乐。正好我第二天被派工进城拉食堂用品。他交给我两封电报稿，是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意思是我已解放，永远跟党走革命之类，郭小川也交给我类似的信件让我进城去寄。我临走，严文井悄悄塞给我几块钱，嘱我买两三斤“什锦糖”，请请大家。严文井还补充一句：你也有一份噢！我高高兴兴地走了。

没想到两三天后就开全连大会，军宣队长严厉批判道：有的走资派，组织上对他宽大，解放了他，他请什么“解放糖”，来拉拢群众，这是什么作风？你以为解放了就没有问题了？不要说严文井，我们都听得战战兢兢。

这就是所谓的“解放”，不管你获没获得“解放”，都生活在动辄得咎的环境中，说不定什么时候看你不顺眼，“走资派”的帽子就会又给你戴上。

在白尘伯伯的《牛棚日记》中，1971年2月8日的日记也有对我父亲的一段记载。

……又闻严文井未能参加两代会，是因Z于春节间请他吃过饭，是拉拢腐蚀云云。Z,Y辈过去对严动辄吆喝，及严将解放，则“老严，老严”，状极亲密，而今又邀为上宾，前踞后恭，亦可晒也。

这也可算是动辄得咎吧，当时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可见一斑。

对前程不敢抱有幻想

在向阳湖寻觅时，当地一位记者曾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农村插队时，许多人的父母在五七干校，你认为插队与五七干校是一种什么关系？

“血脉关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插队的知青与在干校的干部本来就

是血脉关系，而且干校就设在农村，与插队属同样的地方，只是体制不同，干校发工资，有人管理，尽管这管理十分不近人情，但生活有保障；插队挣的是工分，那时农村都很穷，知青的生活没有保障，还得靠父母供养，但农村的生活相对自由，不至于动辄得咎。当时是干校的父母牵挂着插队的孩子，插队的知青想投靠父母，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得在一些老干部得到“解放”后，有些知青就陆续投靠了父母，不久又传来他们或当兵，或进城当了工人的消息。对此我甚是羡慕。尽管我代表我们知青点参加过几次盟里、县里的知青先代会，但想到将来的前景，总是感到茫然、黯然。毕竟我是在该考大学的年龄来到农村的，如果没有文革，到了1971年，我都该大学毕业了呀！

有人劝我，何不给你爸爸写封信，他是老延安，凭他的名气与关系应该认识很多人。再说，他也没问题，解放了呀。于是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提出想让他帮我联系当兵的要求。

他很快回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

欣久：

15日信收到。

我这封信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我所写的都是目前我尽我的能力所能体会的东西，是认真负责的，而绝不是敷衍了事的。

第一，我认为你必须充分准备的是两三年内安心在农村工作，这样才是积极的，才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消极方面来说，也只有这样才不致犯错误。主要是要从积极方面着想。我相信你一定会记得主席的两条教导：一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二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结合，便将一事无成。你不是你们村里铁姑娘队长么？这在我听来，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这说明，你是贫下中农所需要，所看重的人；同时也表明了最近两三年的很大的进步。

第二，既是贫下中农所看重的人，那么，也就是国家、是无产阶级所看重的

人。无产阶级对这样的青年可能培养她（或他）在农村继续深造，让他们面临更艰巨的考验，肩负更重的担子；也可能根据革命的需要，让他们到别的岗位上去接受更艰巨的考验，肩负更重的担子。从这些青年同志本人来说，现在要做充分精神准备的，是在农村奋斗一辈子，在什么地方就把什么地方的工作搞好；下定决心，不屈不挠为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改造自己，也改造客观世界；下决心为改变农村的面貌立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至于党和国家有可能重新分配和调动他们的工作，自己先不要去设想；因为这样设想会分散自己的精力，搞不好当前的工作，更值得耽心的，是可能走错误道路。

第三，如有可能，我们当然愿意支持你参军，因为这也是为革命贡献自己一切的一条光明大道。但我并不认为，你如果不参军就不能为革命做出贡献了。还有，如果你留在农村，为革命贡献力量的可能性就要广阔得多；而去部队，这种可能性，因为是女孩子的关系，就不能不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而比较要小一些。

第四，我如果站在旧时立场上，我会婆婆妈妈得多，会比你更多考虑你的年龄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你知道，过去十几年来我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这个立场没有很好地转变。我如果允许我自己回到旧的立场上去考虑你的问题，不仅会对你没有帮助，而且会害你。接受了我犯错误的教训，我得和我的婆婆妈妈（这仅是表现）作斗争。我明白你现在所走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但我确信你是走对了，因此我的信心压倒了我的耽心。走下去吧，勇敢一些，向一切困难斗争下去，孩子。

第五，革命就是变动，就是最大的变动。为革命的胜利，一个人的工作会有千变万变。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不能为你算命，但我相信，你的一辈子还会有不少变动。如果你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许到了某天要调你去学习什么的

时候，你还不愿离开现在这个地方哩。

下面，我谈一些技术性和事务性的问题。

我确实不认识军队上的负责同志（的确我认识不少人，但都不是部队上的）。

郭小川同志的女儿有你现在有的一模一样的问题。郭，他倒认识不少军队上的同志。他去冬回京探亲，为他女儿进行了不少活动，（你知道郭是一个“有办法”的活动家，我根本比不上他）但都没有结果，他女儿只好仍留在农村。

我打算今年九、十月间回京探亲，上一次信里已告诉你了。我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努力安排，不滥用假期，到时候，你好请假回京见面详谈。

如果万一，我必须在九、十月以前就回京一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回去，我一定事先给你一电报，好让你安排请假回京见面，总之，今年内我一定得好好和你当面谈谈。

如果我分配了工作，对你的问题有可能从更宽的角度来考虑，我想我会随时把新的考虑和你交换意见的。但那是后话，现在很难设想，我将会有什么新的设想，就是将来可能有新的设想，我想我们都不会，也不应该，离开做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这个大方向来研究一切问题的，你说是不是？

小妹自费学医的问题，这个“自费”的“费用”我们可以出。但不了解的是：这样做合不符合党的政策？如果可行而又不违反政策，具体如何实现这办法？经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办到这件事？希望下次信里关于这几点你能谈得详细一些。了解了这些，我就可以进一步表态了。

这封信请转给妈妈看看。

我心里关于你们的问题想的比你信上写的要多得多。但那些无益而且有害的话，我边想就边自我批判，因而就没有暴露那些活思想。现在写下的，我相信，

没有什么好听的甜言蜜语，但不会害你们。我已经跨进了老年的边缘，我希望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是害人的东西）从此少一些，我们父女为革命都变得更刚强一些。

再谈

爸爸 3月20日（1971年）

队长同志：你如果眼光远大一些，就应该抓紧帮助培养你们队里有更多的副手，都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而不要一人单干。又及

时隔37年了，至今我读这封信时，心中都充满了酸楚。我读出了父亲的无奈与苦衷。我对自己前景的忧虑能不触动父亲的心弦吗？而他在那种动辄得咎的环境中，敢发牢骚吗？即使心中有怨言也都先自我批判掉了。诗人郭小川，因写了一首心向北京的诗，被无限上纲，无端遭批判，哪个还敢说前途，想前景啊！父亲的信是写给我的，其实也是写给他自己的，是边写边自勉，内心在作苦苦挣扎。他是真的想从内到外都做一个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啊！

1995年，父亲在接受李城外的采访时说：“‘五七’战士多半（包括其左派）都是想回北京的，要说谁甘心落户咸宁，是不真实的。有的人是绝望了，我属其中之一。在那种高压的气候下，还得认命。我真想不到什么时候还要我回来，没抱什么幻想……”这些话也可看作是他写这封信时的心境。

一波三折的探亲

从父亲1971年3月20日的信可以看出他在安排家人团聚的事。在以后他给我的几封信中，谈的也基本上是有有关探亲的具体安排。可见他对这次团聚的重视。他在决定了探亲日期后，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

欣久：

我决定九月中旬（例如，我打算十五或十六或十七这几天动身离咸宁）回京探亲（这是军宣队告我，我们连九月份不能开始整党才定下的）。我打算九月初

给你汇一笔路费去。如果到了时候，干校有什么紧急任务，使我离不开，我就在八月二十号以后，九月五号以前，给妈妈和你各去一电报，说明届时不能回京。如到九月十二号、十三号，你尚未收到这样的电报，到十五号以后，你就可以动身往北京走了。当然最妥善的办法是，九月十三号你给欣强去一封信，先告他你动身日期。或更早一些，不等我的电报，就早和欣强联系，了解他在那一段时间里哪天大休，以便你到家时，他也在家，至少你可以有办法拿到钥匙，好进门。当然，如九月十八日我已在家了，从那时候起，你再到家，就更方便了。

爸爸

八月一日 (1971 年)

也许是老天护佑我吧，父亲这封信还在路上的时候，我已经被内蒙古电讯局选调到微波大队工作。当时选调的标准为必须符合当兵的条件，父亲能在 1970 年获解放还是帮了我一把。此时哥哥已从甘肃复员，在密云北京精密机床厂当工人，两个星期大休一次，是家里的总管与留守人员。

紧接着，八月九日，父亲又来了一封信，报告妈妈可能不能如期探亲了。这时他还不知道我已参加工作的消息。我们插队的地方已从五、六月起，开始选调知识青年了，同时还传来大学要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他很希望我能继续读书。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欣久：

7 月 28 日信收到。妈妈的干校最近要迁移，集中搞斗批改，新地址尚未最后定，让我暂时不要给她去信，所以你这封信我就没有转给她。

估计九月间，一直到冬天，妈妈都不一定能离开她们的干校。但我考虑还是在九月间回京探亲。见不着妈妈当然很遗憾，但能见着几个孩子，彼此好好谈谈，互相帮助一下，也算不虚此行的。所以我预定的探亲计划不变，也希望你到了时

候回北京，好当面细谈一切。到时候小妹回不回，请你考虑。她回北京次数比较多，而且回去的表现也不好，见了面又不肯听我谈什么，所以，我倾向于这次她不回。如情况有较大变化，小妹有所觉悟，你又赞成她回，我也可以重新考虑。

外语学院在内蒙招生情况如何？如有可能希望你能报名投考。只要让你去报名，我认为你考上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九月五、六号之间，你可能收到我汇给你的路费。我打算汇给你五十元。如多了一些问题不大，你留着用就是了；如少了一些，你就先向别人借一些，等你到北京后，再设法归还。估计这笔钱是够用的。

余面谈

爸爸 八月九日（1971年）

我选调后，经过一星期走步操练的集训，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在呼和浩特市挖防空洞。可以说，当时呼市再也找不到比我们更棒的劳动力了，四十多个壮小伙、铁姑娘，把机关干部十多天才能挖完的土方，仅用了三天就呱呱叫地完成了。接着我们被叫去支援其他单位劳动。当初我们选调的时候，接我们的电讯局干部骄傲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很艰巨，要让内蒙人民当年就在电视中看到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但是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始终在挖防空洞。我见暂时没有学习任务，决定请假回京探亲。但是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原因是我们这批刚从农村选调上来的人，一切都按学徒工待遇。每月16元的工资，三年学徒期满。学徒期间不许谈恋爱，不许回家探亲。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大几的人了，工资给的少没有办法，但不准谈恋爱，不准回家探父母实在有悖人之常情。那时电讯系统也是军管编制。我找连长、指导员请了几次假都没获准，只好向父亲求援，接连写了两封信，希望他能在干校以组织的身份，证明我们父女有三年没见面了，帮助请假云云。

父亲因外出，直到九月初才给我回信。

欣久：

不久前，我曾离开连队，到“地区”去帮助修改一个准备纪念《讲话》的剧本，

约十天。返回连队后，看到你 8 月 18 及 23 的两封信。

你信中的意思我没全懂。“组织请假”，如指是我们干校帮你请假，恐不好办。我想你有两种可能返京一趟：1、你向你们组织上请若干天事假（放在国庆前，可以连国庆一起在北京度过）；2、国庆前一天经组织同意，返京度国庆。

还是争取第一方案为好。你可向组织说明，几年未和父母见面，而父母双方的干校均面临斗批改最后阶段，明年父母都有可能分配工作，此次父母回京安排家中一切，需共同商量一下，等等，估计你们的领导是可能照顾这种情况，给你若干天假期的。希望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谈谈。

我九月中旬到家，到家后一定会给你去电报。

小妹回家事，欣强有不同意见。我准备回京和欣强商量后再定。

时间紧，就写几句，余面谈。

爸爸 九月二日（1971年）

收到父亲的信后，我立刻又去找指导员谈了一次，他仍是强调规定不给假。我急了，又怕父母等得着急，就立刻往北京发了一个电报。这时父母均已回家，一起给我回了封信。

欣久：

电报收到。既然“领导一律不准假”，我想，对你这样一个团支委和副班长来说，无论你自己或家中人都不好、也不应该为请假的事再提什么要求了。好在你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和妈妈的单位也都进入了斗批改的最后阶段，一家多数人团聚的机会总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根据国务院规定，学徒阶段过去后，只要工作半年，就可以享受探亲假（路费由公家报销）。不知你们训练班为期多久。我想训练班结束后，你们应该是正式走上工作岗位，而不需要再经

过一个学徒阶段；那么，如果暂定你们训练班为期半年的话，最晚明年冬，你也可以享受探亲假了。到那时候，妈妈也可能分配工作了，说不定我也可能分配工作。一家多数人见见面，可能比现在容易一些。方便一些。总之，今年暂时见不着面，但明年见面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本来打算。如你不能回京，我和妈妈去呼市看你。现在考虑，这样做很不划算。首先得花一大笔钱（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到呼市后，估计经过交涉，顶多也只能和你见一两面，而一往一返，我和妈妈假期就得用去好几天；和你既不能深谈，而我们两人该在北京办的事又办不完，匆匆忙忙，一头也不踏实；所以我们考虑，这次就不去呼市看你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在“十一”这三天假期中你能否回京一两天。如国庆假三天，再加上请上四、五号两天假，你二号能到家，四号再动身往回走，那么你肯定可以见着妈妈和我。妈妈是十月三日往回走，我是五号往回走。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估计这个假也不好请，就不要开口了。三年多的考验都经过了，何苦为这点事闹个不安心的表现。你现在是团支委和副班长，很多人都看着你，你只能以身作则，以后工作才好做。

小妹这次不回京了。一则，她自己有这样的表示；二则，我和妈妈研究，这次她回来，我们顶多只能和她谈两三次话，余外的时间，我们去办自己的事，结果就把她撂在一边，她一个人无聊起来，呆在家里不是办法，让她到处乱跑更不是办法。而且今年她回过几次家，农村的活儿刚熟一些，就又在城市待一阵，对她的改造不利。她现在各方面都有进步，让她在村里坚持一阵，冬闲的时候，再让她回家住几个月（在家还要委托她一定的任务）。我们认为这样安排比较好一些。从李化彬、大同等人的来信看，小妹的分配还是有希望的，只是时间早晚而

已。你放心好了。

估计你内心还有些矛盾，例如学外语与数理化的矛盾。这也怪不得谁，你也不必后悔（假如有的话）。你不能不接受公社的分配（特别是他们一番好心，为你争取了去电讯局这一前途）。因此你不能等在村里等外语学院来招考（当然从我内心来讲，你学外语是有条件的），既已到了电讯局，就安下心来学你不熟悉不太喜欢的这个新专业吧。这个行业对我们国家说来是非常需要的。不会的东西只要肯钻，一定可以学会的；不喜欢的东西，钻进去了之后，就会产生感情的。数理化也不神秘，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希望你不但能钻进去，掌握这门技术，而且应该积极有所作为，为人民，为革命有所创造发明。西班牙语你有时间，还可以抓紧自修，千万不要放弃了，放弃了太可惜。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各种人一辈子该走的是什么具体道路，自己不能预计、掌握；但我们能控制掌握的是让自己一辈子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走革命的道路。大方向对了，具体工作到时候根据需要有所调整，也是常有的事，不过现在不好算命。

希望你积极总结在农村改造这三年多的经验，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自觉地解决内心一切矛盾。我们和你见了面，主要打算谈的也就是这样一些话，说来说去，还是要靠你自己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今后这几年，你生活上有任何困难，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还如既往，尽一切力量支援你克服困难。全家人对你艰苦朴素的作风都有深刻印象，完全信得过你，希望你不要客气，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们提出来。

你要学得更坚强一些，满怀信心和勇气面向未来。我们相信你能战胜一切困难，变成一个更成熟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

祝你好

爸爸

亲你！小久子！

妈妈

9月14(1971年)

就在我已不抱什么回家探亲的念头时，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就在食堂里的人已基本走光时，进来一位慈眉善目、魁伟的蒙族老军人。我断定他是一位领导，就趁他买好饭后，在他旁边坐下来。果然他是一位团长，正好管着我们的连长、指导员。我向他讲述了几年没和父母见面的情况，他认真听着，不时同情地点点头。末了，我说，我知道学徒期间不准探亲请假的规定，能不能让我在“十一”这三天假中，回趟北京看爸爸妈妈一眼，我保证不超假。老团长听后立刻说，父母与儿女相互思念，人之常情。三天的时间太少了，你刚到北京就得往回赶。给你一个星期够了吧？记住，一个星期你必须按时归队，这是纪律。

探亲的事就这么搞定了。我没再往北京发电报，为的是给父母一个惊喜。

父母都明显的老了憔悴了，而那一年，父亲56岁，母亲还不满50周岁。父亲把该说的话都在信中说完了，所以我在短短的几天里主要享受的是天伦之乐。我们都缺营养，也都身体疲惫，所以每顿饭几乎都在外面吃。每当父亲吃肉的时候都会提起一个遗憾，而且简直是念念不忘。

那是一次开饭时，菜里见了一点荤腥。炊事员给他挖了满满一勺菜，上面有五六块肉。父亲暗自高兴，终于可以小小改善一下了。可能是炊事员觉得菜给得多了吧，就把勺子一抖，掉下去两块肉，父亲不好说什么，只盼其余的肉能归他所有。然而炊事员把手再次一抖，又抖落下去两块肉。这顿饭吃得他既窝心又难受。

父亲还讲过一次历险记。父亲的身体在干校算得上壮劳力，被挑去拉大车。每天清晨五点出发，到三四十里外的城里装上七八百斤杂货，再呼哧呼哧地往回赶。天黑之后，路上没有灯火，只能摸黑往前赶。疲乏时总想喝上一口白酒解乏。平日拉车，他都是拉帮套。一次拉车来到一处陡坡前，驾辕的人突然停住，把辕交给了他。由于他经验不足，下坡时放手太快，车子产生的加速度呼呼地推着他往前跑。前边是一处拐弯，上下是陡峭的悬崖，他控制不住了，并有些乱了方寸，

直奔山崖冲下去。恍惚间，他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大声喊：“往左！往左！”他这才醒过神来，将车把往左一带，车速减了下来，但仍刹不住车。这时，他已镇静下来，又将车把往右一打，才将车子控制住。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他都会说，捡了一条命。命虽说是捡了回来，但他的身体上也留下了这次历险的痕迹。在他回京后的一次检查身体时，大夫问他，是不是做过什么重体力劳动，脖子压坏了，骨质增生。

父亲调回北京前

父亲回干校后，不久恢复了组织生活。这对他来说，是他“解放”后的又一件大事。尽管很忙，他还是很及时地告诉了我这一情况。

欣久：

最近非常忙，所以上次我给欣强的信，也当成是给你的回信。想来你已经看到了。

我于昨日（12月11日）正式恢复党的生活。这是我一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要把它当作自己革命的新起点，一辈子搞马列主义，一辈子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劝你好好学习一下新党章，特别是其中的党员的“五个必须做到”。为了学好这一部分，你还可以找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即谈到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一起学习一下。

最近两报一刊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也劝你反复学习几遍，并逐条都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提，这样做。

今年七月一日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最后一部分总结的八条经验，也可以同时阅读，并也好好想一下，这样，你就会对许多问题加深理解。

近况如何？新年中能回北京和妈妈、哥哥、小妹见见面吗？我身体很好，请勿念。

爸爸 12 月 12 日 (1971 年)

我从北京探亲回去后，不久开始了专业培训学习，并于 1972 年 3 月结束了学习，然后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在东北的实习生活。这期间爸爸给我的信都很短，也许是没有牵挂了吧。但探亲见面仍是我们写信的话题。

欣久：

12 月 19 日信收到时我正忙，没给你回信，以后就给你汇了二十元去，想已收到。汇钱时也未给你写信。

奶奶于 12 月 19 日去世，我是 25 日才得到消息的。当天赶到武汉。第二天欣强也赶到了。我们和二叔一起，去武昌郊外安葬了奶奶的骨灰。以后我就回连队了。新年假期中，我集中全力抄改自己斗私批修发言稿（组织上要的），衣也没洗，也没给家中人写信。

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今年下半年我仍在干校，当然到时候我回京探亲，你也可以在那时候回京探亲。如果情况有变化，下半年我不在干校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我们再联系，看如何和妈妈一起见面，总之你有了探亲假就好办。

我们这里是乡下，什么新学习材料也没有。有时城里新华书店有了新书，还得托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你在呼市，可以自己注意一下，常到书店看看有没有马列的新书出来，自己去买。

我们这里正下大雪，比较冷，不多写了。

爸爸 1 月 9 日(1972 年)

欣久：

1.7 和 1.9 两封信都收到。

很高兴你开始了新的学习。我和二叔叔、欣强的合影是在爷爷、奶奶的骨灰合墓前照的。我现在就是这个打扮。

今年春节，我们干校不少人要求回京探亲。到处都有一股风，说是春节后各干校要进行大分配，所以都沉不住气了，纷纷要求探亲。好像不早享受一次探亲假就会吃亏似的。我自己是管这方面工作的，我必须沉住气，不凑这个热闹。



湖北没有农闲时期。现在我们连种的地调换了，因此忙着盖新工棚，修新田埂。干校又抓修路，我们自己又抓修养鱼池。反正事儿不少。

(上图：右为严文井，左为严文井的二弟)

我又一次学《共产党宣言》，觉得又有新的体会。马列的书，要反复认真读，才能多懂一些。

你好

爸爸 1月29日(1972年)

欣久：

2月25日信收到。今年2月29日是你四年才能碰一次的生日(注：我生于1948年2月29日，这一年是闰年，2月份多一天，就是说每过四年，2月份才有29日，我才能碰上这个生日)，早就想写信给你祝贺，但事情一多，再加上

我的拖拉作风，今晚才正式向你祝贺你的 24 岁大庆。希望你发扬从农村学来的一切优点，树立为大多数人服务，一辈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观点。你们是可以见到 21 世纪的人，希望你在今后若干年取得更大的进步。首先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好好干，迎来一个在全人类都认为是美好的二十一世纪。

妈妈在春节中批评了你，可是在背后，对我却大大表扬了你一阵。你能抓住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这可令我高兴。希望你永远不要丢掉这个武器。

小丁丁的照片受到我们连队一些同志的称赞。不用说，我是感觉有趣的。今年九月，我回去探亲可以亲自逗他玩一玩了。到时候，你也回去。下星期起，我们全力备耕。学习情况，和你那里差不多，就不谈了。

祝好

爸爸 3 月 4 日 (1972 年)

欣久：

信收到。对你的学习计划，完全赞成。首先学习马列主义，这是最重要的。要紧的是要持之以恒，认真耐心的学。最近我学《国家与革命》，从春节到现在，粗读、精度，共四遍，这才体会到主席教导的“认真看书学习”这一句话的意思，首先是要认真，任何一个重要的观点，都千万不能马马虎虎的放过去，上下文的意思，也只有认真领会才能贯通。这样的书是自己看的，如果靠听别人朗诵，是不成的。

只有做到了“认真”这一点，才有可能“弄通”。当然“弄通”还得联系实际，还得实践，实践以后，又反复“认真看书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逐步加深体会书中的精神实质，以至能运用得更好。当然，由于个人的经验不同，特别是青

年人，阅历较少，能联系的实际材料不多，学习所得会有多有少，但是只要坚持下去，总会可以“通”，或达到比较通的程度的。

外文，希望你一定能坚持复习，并通过自学有所提高。

你不担任工作了，并不因此灰心丧气，这态度是对的。但希望你总结一下前一段的工作，特别是自己的精神状态，例如：是不是有优越感，自满情绪，松懈情绪等等。

我们已开始播种工作，浸种，整秧田，积肥，修田埂、水渠，等等，已进入忙碌的时期。此地天气不太好，最近阴雨较多，旱象虽除（这是好事），可劳动起来就增加不少不便，好在三年来和雨水、沼泽、泥泞打了不少交道，这难不倒我们。

我们还没正式得到分配的消息，但从种种迹象看来，今年分配大批人走是可以肯定的。我自己则作留在干校的长期打算，因此我仍想八月间回去。行前一定通知你。

爸爸 3. 19 (1972 年)

欣久：

3月25日信收到。

丁丁等的照片我也收到了，这小子挺聪明，至少看神气是如此。

欣强给你的信是一番好意，所劝告的话许多是中肯的，希望你好好考虑。

我们正在春耕大忙中，气候不太好，忽冷忽热。收完早稻后（七八月间），如无特殊变化，我打算回京探亲。我们连队享受探亲假的人今年都提前探亲了。像我这样可以回而没有回去的人，剩下没几个了。到时候再和你联系。一切均好，

勿念。

爸爸 4.2

欣久：

4月12日信收到。

希望你下决心上“社会大学”。这个大学是比什么大学都还要好的大学，只要自己肯努力学习，多方面学习，从社会大学实践中培养出来的人肯定要比专门大学毕业的人要强，当然如果组织上决定你继续进大学那是另一回事。我同意你自己的估计，这种可能性是较小的。那么希望你克服一切困难，斗争锻炼下去，踏踏实实地走路，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坚决为人民服务，你肯定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九、十月份，我认为你还是有可能回家团聚的，到时候再说吧。

哈尔滨是你出生的地方，咱家就你一个生在哈市（铁路医院），我估计你以后会喜欢那个地方的。

最近我们是农忙大忙季节，不向你描写这一切了。反正我身体还不错，还能顶下去。

给李化彬写信时，代我问候他。

爸爸 4.14（1972年）

我保留的父亲在干校时给我的信就这么些。有些信可能遗失了，但主要的都在。而由于我已离开农村，我的前程已不是家人关注的重点，爸爸妈妈的分配成了全家的关注点。

我去东北实习后，父亲由于忙，主要由妈妈给我写信。

1973年的3月，父亲终于结束了在干校为期五年的生活（妈妈是在父亲的工作定下来后，才回到北京。这时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记得他说过，他本想悄悄地离开，怕影响大家的情绪。但那天他离开时，还是被大家发现了。大家争相来送他，使他心里热热的。他并没给我们讲过，在揪“五一六”热火朝天的时候，在黑夜中他递给正在受审的阎纲一块桃酥的事；也不曾听他讲过，在周明关押时，他利用探亲的时间去看望周明家属的事；以至后来为军代表擦屁股一一为“五一六”落实政策等等，都是在父亲去世后，我看了怀念他的文章才得知的。这些应是大家真诚相送他的原因。

如果问我，农村生活给我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使我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最真实的生活。尽管我在最该学习增长知识的时候，被迫中断了学业，而且我绝不会把无奈说成无悔，但这段生活的确是我成长中坚实的奠基石。

父亲受的磨难远比我深重得多，但他对所经历过的一切淡然处之。1995年，李城外在采访他，问及他对向阳湖的印象时，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写，就说有个姓严的曾到过向阳湖。”这种淡然决不是淡忘。因为，他还对李城外说，对向阳湖“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是武汉人，老家甚至会淡忘，咸宁却今生难忘！……那段岁月但愿不会重复。”

在为向阳湖的碑林题词时，他仍是那么淡定，一句“向阳湖，我的过去了的的生命。”似是对向阳湖生活的概括，也是他为向阳湖生活画上的句号。只有会品味的人才能掂出它的分量。因为中国社会从古至今有多少大人物、大知识分子曾被流放或惨遭迫害，屈原、司马迁、苏东坡……与之相比他觉得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实在算不上什么。就像他在《我仍在路上》一文中写的那样，“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但不为自己哭。”对向阳湖，他有个衷心的祝愿，即希望当地农民的生活能有所改善。

我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向阳湖农民的生活的确是在变好，也许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但生态环境正在恢复。他们也许不记得有一个姓严的曾来过向阳湖，但他们没有忘记，那一年，曾有六千多北京来的知识分子到过向阳湖，在这里“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晴天不干，搞大批判。”“想回北京回不了。”当我们在向阳湖寻觅的时候，这些农民关切地询问当年来过这里的人可好？还拿刚从地里摘下的西瓜款待我们。他们纯朴依旧，让我们为他们的平安与幸福祈福吧！

【乱世民情】

在“清队”风暴中倾覆的家庭小舟

姜东平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如果不是突遭变故，方淑云（化名。本文所有人物均隐其真实姓名——笔者注）的家庭是令人羡慕的。她的丈夫是长春驻军某部的营级干部，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家境虽然算不上富裕，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可方淑云还是感到满足，她习惯了这种风平浪静、随遇而安的生活。就在她有了第三个孩子，怀孕8个月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

本属平常的姐妹通信

1969年春节前夕，方淑云所在的驻军幼儿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入向党“交心”阶段。“清队”是文革开始以来政治运动的又一个高峰期，也是冤假错案最多的时期。由军、工宣队掌舵，“依靠群众办案”，是这次运动的基本特点，全党动员，全民参战，要对“阶级敌人”进行“稳、准、狠”的打击。向党“交心”其实是“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向毛主席“表忠心”，坦白历史，交待问题。方淑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如坐针毡的滋味。

事情还须回溯到山雨欲来的1965年。

那年5月，方淑云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一次大连。目的是解决妹妹方淑贤和未婚夫刘瑞元的感情纠纷。

方淑贤和刘瑞元是大学同学，1962年，他们一同分配到工厂。一年后，二人先后由科室下车间劳动，当时方淑贤认为是刘没干好而影响了她。因此，对刘有了反感。按照厂里规定，大学毕业生在厂劳动实习一年后转正，但刘瑞元却因故延期半年。1964年，刘瑞元又受到共青团内警告处分。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分歧，二人的感情逐渐疏远，同时方淑贤对本厂另一位大学同学宝清产生了感情。

处在恋爱关系的矛盾之中的方淑贤写信告诉了姐姐。因为她从小和姐姐一起长大，感情远远胜过家庭其他成员。

姐姐劝她尽早结束这种三角恋爱关系，放弃宝清而与瑞元重新和好。为此事，姐姐带着两个孩子于1965年5月来到大连，住了一个星期，主要是调解方淑贤和刘瑞元的关系，顺便来大连游玩。

但是到了1966年春节前后，方淑贤与刘瑞元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

同年6月，大连某厂文革运动日益深入，厂内互相贴出大字报，揭发和检举问题。刘瑞元借机给方淑贤贴了大字报，把她的一些话上纲为政治问题，捏造不少“罪证”。方淑贤把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抄下来寄给姐姐。姐姐回信叫她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同时出于姐妹感情，要她“针锋相对”，也给刘瑞元贴大字报。

不久，车间利用刘瑞元的揭发，对方淑贤进行围攻、批斗，并限制她的一切行动，强迫她承认所有的问题，每天写材料到深夜。方淑贤一生中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更受不了这种高压和委屈，曾经多次想到自杀，一死了之。但为了不给姐姐带来更大的影响，她还是想咬紧牙关挺过去，争取从宽处理，等运动结束后再说。因此，只要是大字报上或刘瑞元揭出来的问题她全部承认，并无限上纲，同时也进行了任意编造，对刘瑞元攻击陷害，写了大量材料。

此后，姐妹间陆续通了几次信，传递有关信息。但是谁也想不到，后来这些通信竟成了一桩冤案的“证据”。

“向党交心”与“政策攻心”

1969年初“清队”开始后，方淑云感到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为瞒着组织给妹妹写信，内容里夹杂着私人报复的成份，采取的手法很不光彩，“是违背党的原则的”。特别是信的后面都写上了“看完烧掉”的字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实上这些信件也没有被烧掉，反而被妹妹所在单位抄了出来，并被当作“证据”寄到了方淑云的单位。在姐妹之间的通信中，妹妹还寄来过二份交待材料，群众对妹妹所谓“反动言论”的揭发使方淑云心惊肉跳，如果妹妹问题的性质上升到了“敌我矛盾”，那么她岂不成了反革命的“帮凶”？为了争取主动，她把妹妹的来信交给了组织部门。另一种担心是地主家庭出身，很可能成为运动的“重点”，因姊妹俩离家较早，

对家庭状况不甚了解，很怕由于自己不知情而被误认为对组织有所隐瞒。

然而，事情比她想像的还要可怕。由于她没有勇气把写给妹妹信的内容向群众讲出来，所以两次“向党交心”都没有被通过，在第三次大会上，她成了众矢之的。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帮助”她上纲上线，说她对毛主席不忠、不热爱，“并把平时生活的情调，工作中的过错都说成是有意的，是本质问题”（方淑云1972年4月2日申诉信）。最令她感到震惊的是，有人带头喊起“打倒反革命分子方淑贤”，“打倒反革命分子刘瑞元”的口号，这种暗示意义她心里十分清楚，是在敦促她与妹妹“划清界限”，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没有亲情可言的。此时年关临近，她又怀有八个月的身孕，感到心力交瘁，思想防线处于崩溃状态。因此她只求能够顺利过关，早点结束这种难捱的局面。

于是，她给主持会场的某干事递了个条子，请求向组织“个别交待”。某干事接过条子后宣布会议暂停。从这时起，方淑云即被告知不许回家，隔离审查，交待问题。

这天晚上，方淑云向某干事“个别交待”了如何帮助妹妹出主意的过程。某干事却露出一脸不悦，说：“这个问题有什么好‘个别交待’的？”方淑云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我帮了不该帮的忙，犯了大错误。”某干事叫她好好想想，不要在信的问题上兜圈子，要把“应该交待”的问题交待出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方淑云被通知去参加批斗大会，她心里忐忑不安，以为这一定是要批斗她了。但当她来到会场时，才知道是批斗本部直政处家属干事胡某某，对其“指控”是1948年在浙江余姚县被敌人逮捕，判刑6个月。由于她“贪生怕死，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自首变节，证据确凿”，因此在这次“清队”学习班上被作为重点批斗和打击对象。这次会上，对胡某某实施了“当场扣留，看管审查”，胡某某被反剪双臂押出了会场。

批斗会结束后，某干事对方淑云讲：“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胡某某不老实交待问题，结果走上了‘从严’的道路，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问题。”方淑云实在想不起自己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交待。某干事不耐烦地提示她说：“你说说‘大坏蛋’是怎么回事？”

这一问使方淑云吃惊不小，她想起妹妹在信中提到的一件事：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方淑云去大连时，她的儿子小石头曾喊过“×××大坏蛋”的反动口号。

想来想去，自己从未听到过，显然是有人恶意的捏造。因此她对某干事说，这不是我讲的，也没有听到孩子讲，不过妹妹在信中提到过这件事。

某干事的语气咄咄逼人：“孩子的话反映大人的问题，你说，到底是谁讲的？”方淑云坚称不知道。某干事又说：“你妹妹和刘瑞元他们是想走从宽道路的，他们把问题都交待出来了，并且揭发了你。”

方淑云又是一惊：这不可能，“我们中间没有讲过任何政治方面的话题，也没有听到他们讲过这样的话。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揭发呢？”（方淑云 1974 年 4 月 2 日申诉信）

某干事说：他们的材料是有根有据的，你要好好想想自己的出路，我们是在帮助你，帮你走上从宽之路。

审问持续了几天，弄得方淑云身心疲惫。她被隔离的地点距家属区很近，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小石头在外面玩耍，想起自己的处境，真是万箭穿心。她后悔当初不该管妹妹的事情，到头来对她加以政治陷害。“他（你）们二人害我，那我也就害你们，反正要倒一起倒，谁也好不了。”

方淑云在申诉信中是这样记述的：不是问“大坏蛋”那一条是谁讲的吗，我就先承认是我讲的，可是承认了一条之后，若干条就来了，还有没交待出来的，要彻底。我心里想，讲什么呢？首先讲平时和他们的对话吧，讲对劳动的不满、想过好生活，想高工资之类的东西，可是不行，说我避重就轻，只讲皮不讲肉。于是又交待政策，要讲严重的。（我想）只有敌人的话就（最）重，就拣最重的讲吧。于是把古今中外、街头巷尾的大小字报，有关材料中大小反动人物的话，以及妹妹来信中能回忆起来的東西，边交待边“做文章”。经过一问一修一改，写成了一份材料，（办案人）算是比较满意了。

对临产孕妇的逼供

春节前夕，方淑云终于回到了家里。此时的方淑云还不能充分估计到由于自己的胡编滥造，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怎样的恶果。

她对丈夫老成说，这次我被隔离，他们逼我交待了很多问题，有几十条“三反”言论。她讲了几条给老成听。老成问她，这些都是你说过的吗？方淑云说，我交待的这些言论都是假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不承认不行啊！不过组织上

说，要搞清楚的。老成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叮嘱她说，你光在家里说没有用，应当向组织讲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不能就这么认了。

春节过后，心事重重的方淑云找到某干事说，我的材料还要再考虑一下。某干事大为不满地训斥她：难道材料还要修改？是假的吗？不能真真假假的，自己的出路，你要好好想想。方淑云哪里还敢推翻原来的交待，于是把材料原样抄了一遍交给某干事。好在组织上有话，要搞清楚的，干脆听之任之吧。

1974年4月2日，方淑云在申诉信中做了如下叙述：

1969年春节过后，又开始要材料了，说我没有交待完，还有，要彻底，要考虑自己的去路。有一天，大连来了两个人和我单位大约10人左右坐在一起开会，要我讲材料。当时我想这些东西不是从我口中出来，现在要我讲，心中又急又难过，我一生中虽然没有为党做出什么贡献，但我绝对没有讲过这些可恶的话，我不能讲，所以一直坐了几个钟头，我始终没有讲材料上的东西。我只讲：东西都在材料上，如果还要材料的话，我可以再写。会散之后，我仍然按照春节前的办法，材料上加一些落后人骂人的话，又经过办案人的提示，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或帮我起个头。政治上的东西实在想不出来了，又把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事加进去。一直搞到1970年（应是1969年——笔者注）3月25日早上我临产为止。经过反复修改，形成一份完整的“反革命”材料。

“反复核实”铸成冤案

1969年3月，长春二位办案人员来到大连某厂，与方淑贤见了面，并将方淑贤和刘瑞元扣留在厂里交待问题。

笔者见到了方淑贤1973年11月19日的翻案材料，其中一段文字叙述了与姐姐方淑云极为相似的交待经过：

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姐姐的思想比我进步，过去一直叫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靠拢组织，好好劳动等。1965年3月，姐姐给我寄了一套毛选甲种本，当

她来大连看到这两本书时问我学了没有，我说学也没用，只要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就好了。当时姐姐批评我，叫我一定好好学主席著作，安心工作。我曾对×××说过，我的家庭成份是“土地的主人”(不愿意说成地主——笔者注)，姐姐批评我不要乱说，应当认识谁是土地的主人。姐姐来大连时，我们之间也没谈到过有关政治问题。所以当长春来的人向我问话时，给我点出一些问题，如关于“胖子”、“大跃进”等方面的议论，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印象。我就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给证实。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厂里来了很多人，对我施加压力说，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弄你就是弄对了，你不老实没有好下场。你想走××的道路吗(×××在清队中拒不“认罪”，被逮捕)？问题是你姐姐揭出来的，你姐姐能害你吗？你姐姐正确地选择了道路，交待了问题，揭发了你，你为什么不要学你姐姐呢？

我心里很清楚，姐姐是在政治上撒了弥天大谎，害人害己。可我心里又很害怕，一是怕挨打，因为我爱人(宝清)也被拘留在厂里，被打得十分厉害。我当时身孕7个多月了，要是打我，我和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就没命了。二是怕从严处理，因为问题是姐姐所揭，刘瑞元再给证实，这些问题就成了客观存在，厂里已经肯定我的问题是严重的，“弄我弄对了”，如果我再不承认，就要得到从严处理，甚至逮捕。想到刚刚建立的小家庭，想到即将出世的第一个孩子，想到被关押的爱人，我只好“老实交待”。长春来人和厂材料组点什么问题，我就承认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严重，什么字眼恶毒，什么露骨，我就说什么。这样我写出了一份交待和证实材料。

1969年6月这起案件“经反复核实”，罪名成立结案上报。同年10月，上级党委对方淑云的结案材料作了批复：“其错误事实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不定

现行反革命，作退职处理。”同案人方淑贤由所在单位大连某厂定性为不戴帽的反革命，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另一同案人刘瑞元，因手头资料有限，处理结果不详。

不久，方淑云离开了长春，离开了那个原本温馨的家庭。先是到了牡丹江，远离那个让她做了无数个恶梦的地方，打算“好好当一个家属”。她心里充满悲楚，也怀着一点希冀：“政治上在今后会搞清白的”。

然而到了1970年，却盼来老成要和她离婚的消息，她不知道这是老成的意思，还是组织上的意思。当她见到老成时，看见他“眼泪在眼眶中打圈子”，心里一切都明白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老成也无可奈何啊。就这样他们分手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毁灭了。

1970年10月9日，上级党委再次复查决定，将方淑云“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鉴于清队中主动交待，予以从宽处理，不戴帽子，开除公职，给一定生活费，送原籍劳动。”不久后，方淑云回了湖南老家。

冤案可翻 破镜难圆

作为原定案材料主要依据的“供词”，是方淑云、方淑贤、刘瑞元等三位同案人“主动交待”的产物。按办案人员的话讲是经过“反复核实”，并“证据确凿”的。其主要反动言论是：一、恶毒攻击和咒骂伟大领袖×××；二、污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三、对现实不满，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四、为地主家庭鸣冤叫屈，企图翻案。

1969年6月2日和1972年10月23日，刘瑞元、方淑贤先后推翻了原交待的全部问题。

为此，方淑云所在单位从1972年12月起进行了长达3年的复查定案工作。就原定案由与方淑云及同案人申诉中的主要矛盾，即到底是在“政策感召下，主动交待”的，还是屈服于压力为了过关进行编造的；在调查取证中，是“经反复核实”，三人不约而同，还是在办案人指点下互相证实的；是否具备作案思想基础等问题，进行了复查。

有关方淑云的复查结论报告5000余字，详细记述了根据中央（1972）45号文件精神和其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复查定案工作的指示对这起案件进行复查的经

过，经多次与当事人正面接触，调查取证。复查结果表明：“方淑云申诉所说的经复查证实的种种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方出于对政策的不理解、害怕批斗、暂求过关、胡乱交待假材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交待材料大部分来源于其妹 1966 年 10 月 28 日的信中”，是其妹整理群众大字报中所提到的。特别是在两次交待的“29 条言论中，有 19 条来自此信。原定案的 16 条中，有 11 条来自此信，其余 5 条中有两条与当时的客观环境矛盾比较大……可见原定案证据是不扎实的”。方淑云随军 7 年时间，“没有发现有三反言论”。在其去大连时，方淑贤和刘瑞元的矛盾已经很深，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计后果、共同散布大量“三反言论”。因此三人并不具备共同作案的思想基础。

1975 年 4 月 27 日，方淑云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对其作出平反决定：“方淑云的问题，是在一些客观压力下，由于她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为了暂求过关，编造了假材料；加之办案中缺乏经验，轻信了她的口供，在调查取证中指点了一些问题，客观上起了引供诱供作用，所取证据不可靠。这个案子实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假案。应予平反。”

有关单位撤销了原定方淑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开除公职，给一定生活费，送原籍劳动”的决定，补发了作退职处理后的工资。

然而，她的丈夫老成离婚后已重新组建家庭，并且生育了子女，破镜不能重圆，成为终生憾事。

那一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因此方淑云在申诉信中，只能反复地为自己辩白：“错误思想、言论是有的，但反动言论，有意的攻击，是没有的。”只能深深地自责：“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了玩笑，给革命工作带来了莫大的损失”；“我绝无半点埋怨组织上的心情，因为这一切是我自己造成的后果。”

在事情发生 6 年后的 1975 年，蒙冤者的上级主管部门经过长达 3 年的重新调查，总算作出了平反结论。然而，一段亲密无间的姊妹情被扼杀了，一个夫妻和睦的家庭被毁灭了。

本文资料来源说明：2005 年夏，笔者在吉林省图书馆后面的旧书市场，见到一些文革时期的资料，系由空军某直属机关流散出的。这些资料多形成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涉及多起冤假错案，其中尤以这桩亲姐妹之间在专案组逼迫

下互相“揭发”而导致的家庭悲剧最为典型，故整理成文，以飨读者，以警后世。

【闲读偶记】

文革中的家庭关系值得好好研究

何 蜀

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地方流行过一首显然是由成年人代作的“童谣”：

炮轰爸爸，火烧妈妈，

全家改组，我来当家。

这首戏谑性的童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家庭关系普遍受到这场“大革命”冲击的现实。不过，真正的现实远比这简单的童谣所能反映出来的情况更加严峻，更加残酷。

“第一家庭”破裂的典型意义

1966年的最后一天，首都红卫兵著名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出版了一期不同寻常的专刊：全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这篇文章诚恳地表示要同父亲刘少奇、同家庭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毛主席一边，站到革命群众一边，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文中详细揭发了父亲刘少奇和继母王光美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黑指示”。

刘涛在大字报中写道：“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堪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样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要是你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限，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

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刘少奇的女儿与他“划清界限”，刘少奇向女儿宣布“你也可以不回家了”，特别是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都表明了中国国家元首这个“第一家庭”在文革风暴中的悲剧性破裂。这一事件典型地宣告：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家庭关系也可以成为罪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株连九族”，这都是被民主革命结束了的皇权专制时代的产物，然而，在“新社会”却并没有“一去不复返”，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得到了“发扬光大”。众所周知，在文革初期，以“红五类”自诩的一些高级干部子女提出了“血统论”，公开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类明显反动的论调却披着“最革命”的外衣而一度甚嚣尘上。甚至在这个论调已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报告里严厉批判为“反动的血统论”后，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不衰，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许多地方无论是在辩论会还是批判会上发言，上台后都得首先自报家庭出身，若是出身“不好”，多半就会被轰下台去，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后来知识青年下乡，许多学生意外发现，一些农村竟把地主、富农子女干脆就视为地主、富农，当作“黑五类”实行“群众专政”。

著名学者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在《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一文中回忆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批斗会。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等“黑帮”被先后揪上台示众后，大会主持者点到了她的名字。她被迫上台，按例要站到广播话筒前自报“罪名”，但她不知自己该报什么罪名，就报了个当时流行的可以囊括一切罪名的“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但大会主持者却不以为然，叫她看看给她戴的纸糊“高帽子”上写的什么罪名，她取下来一看，才知道给自己定的罪名是“冯友兰的女儿”。她回忆说：“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宗璞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81 页）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回忆，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由于她与父亲同处一系，她的压力也很大，承受含沙射影的辱骂已是家常便饭，更难应付的是人们逼她揭发父亲。“当时我对父亲的过去并不了解，对他的学术也没有反动印象，反倒是他逼我学马列主义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写的大字报在一些人看来是蒙混过关。……为此，我承受了许多大字报，连我身体虚弱也成了污骂对象。同寝室人甚至将墨汁泼到我的被褥、蚊帐上……”后来，她回到家里，童书业为了不让女儿因写不出揭发自己的大字报而遭受打击，竟提出要代女儿起草批判自己的大字报！童教英回忆及此，无限感慨地说：“父亲对我的关爱我永志难忘。但父亲直到此时还那么天真，却使原本天真的我也深感惊讶。”（童教英《在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 306—307 页）后世的人们，恐怕再难以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中，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爱，竟要以代替女儿写批判自己的大字报来体现！

父母成了批斗对象，可以成为子女的罪名，丈夫成了批斗对象，就更是妻子不容置疑的罪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被揪出打倒的“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人，其妻子不管是否“当权派”或有无所谓的“罪行”，通常都会被加上个“臭婆娘”、“臭妖婆”之类罪名，这几乎成了惯例。这是特有的“家庭关系罪”。

“组织”的逼迫与“中央”的鼓励

读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就可以明白，思想左倾的“革命者”们往往是把家庭观念视为“旧意识”来加以破坏和与之决裂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家庭关系的破坏更成为“史无前例”的“革命行动”，形成一种“时

代潮流”。在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来自“组织”的逼迫和来自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鼓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子女与父母发生冲突，甚至其中一方宣布与另一方“断绝关系”的事件，各地都多有发生。在一般民众中，普遍是因为父母有着“反右派”运动的经验教训，不愿看到子女重蹈当年“右派分子”因响应号召而陷入“阳谋”的覆辙，竭力阻止子女向领导干部造反；年轻的子女则大多自以为真理在胸，“红宝书”在手，坚决到大风大浪中干革命；再加上一些单位的领导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稳定局势，阻止群众起来造反，通常都会打“家庭关系”这张牌，向家长施加压力，甚至以扣工资、停职或开除之类手法来逼迫家长让子女就范。

笔者手里有两封 1966 年底（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印成传单的“家信”，一封是由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串连队油印的，署名“抗大路半工半读民办中学 儿忠党”的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信》（辗转翻印后的日期是 1966 年 10 月 20 日），一封是北京铁道学院赴渝革命战斗组油印的，未署名的写给妈妈的《一封革命家信》（落款时间是 1966 年 11 月 5 日下午）。前一封信中对父母说：“昨天你们到学校来，说学校把我们定成反革命，参加了反革命右派组织，干了反党的勾当，你们劝我洗手不干，不要忘本。爸爸妈妈，你们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忍着快掉下来的眼泪，千言万语，但是嗓子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你们一怒之下说：‘你今后别再回我家了！’”“现在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何况儿真是反革命，是右派，不要说断绝关系，就是把儿打死也是应该的。”“儿反复的学习十六条，觉得儿没有做错。我给坏蛋贴了大字报，使他们慌了，就到家里造谣言，……他们使用手法，使你们把我们赶出了家门，他们的造谣使好多同学和家里断绝了关系。他们使用手法，把我们同学家长的工资扣掉，甚至开除公职……”另一封家信中写道：“今天是星期六，因我有事不回家。我知道我回了家就不能再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不回家，坚决不回家。现在，我身上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但我宁愿在学校挨饿也可以，我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希你不要到学校来找我，如你来找我，我是不会接见你的。你（若）支持我校文化大革命，支持我的革命行动，就请把钱和粮寄到学校来，就不要到学校来叫我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是当时重庆的“官办”保守派组织，由市委号召“红五类”家长动员子女参加），不然，你就是阻拦我校文化大革命，就是运动的绊脚石。”

在子女向父母造反的行动中，更为典型的是一个未成年人的故事：1966年10月6日“全国在京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来自江苏扬州的13岁（初中一年级）红卫兵郭苏扬被安排上台发言，对她父母作了控诉、批判，她父亲是扬州市委监察委员，由于她站在反对地委“走资派”的立场上，父亲就对她进行“审讯”，说她是“右派”、“反革命”，“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她与父亲辩论，坚决不承认是反党，父亲气得打了她两巴掌，但她一直昂着头，父亲又用权棍打她，她就跑了出来。第二天，她母亲又把她从学校拉回家里，“他们用脱离父女关系威胁我，用没吃没穿吓唬我，用人情母爱软化我，并强行把我关在家里三天。”她慷慨激昂地说：“什么‘脱离关系’，什么‘永远不要回来’，什么爹娘，什么人情，都拦不住我！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哪有劳动人民的今天！”（扬州东方红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6日第94期第2版）

据当年小报报道，郭苏扬讲话后，周恩来与她握手说：“好！很有希望。”“勇敢些，战斗！”江青问郭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郭答是1943年；江青又问是干什么的，郭答是打游击的，江青说：“不要怕，游击队员怕什么！”（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政治部《红卫兵报》第九号第4版，1966年12月22日出版）康生在1966年11月15日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和劳动党建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返回北京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同学时的讲话中，也特地讲到郭苏扬那次大会发言的事，康生说：“她讲得好，她跟她父亲母亲斗争。我就问她：‘你兄弟姐妹几个？’她说：‘四个。’我问：‘你是老几？’她说：‘老二。’我说：‘你父亲是不是只喜欢老大、老四，不喜欢你？’她说：‘不是。我们观点不同。’”康生说到这里，和听众一起笑了。康生又说：“她父亲是扬州市的监委。她反对地委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父亲压制她革命，她对她父亲说：‘你过去革命我就赞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对。’13岁的孩子懂得这个道理。她说：‘我们观点不同。’我说：

‘好!’她把毛主席纪念章给我戴上了。我就戴着去阿尔巴尼亚串连。”(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记者记录整理,1966年11月16日;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宣传部印,1966年11月17日。油印传单)

在首都北京举行的全国性公众集会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们如此热情鼓励、赞赏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向父亲造反,这在全国引起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基层“组织”都在要求和鼓励这样的“划清界限”,所以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许多并非领导或并不代表“组织”的人也自觉主动参与其中。学者艾晓明回忆,她父亲艾仁宽(中学英语教师)被学校当作“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宣布“打倒”后,父亲教课的高一一班两个学生(其中一个班干部)就在食堂门口叫住她(她当时还只是小学六年级学生):“艾晓明!你爸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队员,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写大字报揭发艾仁宽,和他划清界限。”艾晓明不得不写了大字报。(艾晓明《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26—27页)

1967年7、8、9月,毛泽东乘坐一般群众不得接近的专列,通过沿途招见各地领导人听取汇报的方式“视察”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10月7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往各地,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泽东在这些“光辉指示”中以赞赏的口气谈到许多家庭的分裂:“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在毛泽东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不知有多少父子反目、夫妻离异、兄弟斗殴、亲属各自为着莫名其妙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参加到势不两立的派别中,甚至兵戎相见……

1968年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刘少奇的子女学习后向中央作出表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就向毛泽东写了表示拥护中央决定的信,表示要进一步和家庭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个批示通过《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发往全国（张绛著《刘少奇一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版 273 页），从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称呼“家庭出身不好”而愿意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子女们的专有名称。这一专有名称的出现，也表明了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破坏旧有家庭关系毫不留情的鲜明态度。这个名称出现之后，不知又有多少遭受打击迫害的家庭的子女为了摆脱“狗崽子”、“反动家庭孝子贤孙”之类恶名，得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称号，而被迫作出了与家庭决裂的举动！

与被批判的亲人“划清界限”成为时尚

1967 年，当北京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观礼台贴出批判作家、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大字报时，她的儿子小波不但没有帮助和安慰妈妈，反而对蒙冤受屈的母亲充满愤恨，并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要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斗，带领一些同学抄了自己的家。小波（老鬼）在自传体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如实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恨你写的那部温情脉脉的书，恶心八叉，使我面无光采”。“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 300 多块钱作为抗美援朝的经费。”“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作儿子的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杨沫必须低头认罪 1”“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打倒臭文人杨沫！”“红卫兵万岁！”……“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的家砸个稀巴烂。”（老鬼《血色黄昏》，中国读书网 <http://www.cnread.net>）杨沫在《风雨十年家国事——〈自白——我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朱明雄编《传记文学选 2》，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5 月版 163—165 页）。杨沫写道：“那天好危险！我如果在家也会被他们反捆起来，口中再塞满破布，有病的心脏，不就很快窒息了吗？所以。我还得庆幸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这么个中了邪魔的儿子，为几个钱，我才不真生气呢。”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后，其妻董边也被打成妇联机关的走资派。他们的

两个女儿多年后回忆说：“‘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很难理解家里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时刻笼罩着我们。妈妈在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我们经常用异样的神情和口气对待她，甚至不再唤她‘妈妈’。”直到两姐妹下放农村，经历了沉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生磨练，从革命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在与母亲“划清界限”五六年之后的1972年，她们去河北衡水探望在干校的母亲，“自‘文革’以来深埋在心底的结怨，涌动成交集的百感，我们紧紧盯着妈妈，不知如何开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是妈妈先招呼了我们。‘妈妈！’我们扑了上去，瞬间，隔在母女间的冰层一下子溶化了……”（曾立、曾自《我们的妈妈董边》，《炎黄春秋》1999年12期）

在作家陈白尘的女儿陈虹整理的陈白尘文革日记中，1966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北京得知南京家中的女儿陈虹批判母亲金玲的事：“收玲信，虹儿对她批判，压力极大，她又揭发不出我的罪行，很痛苦。我们这儿四壁都贴有各人子女写的大字报，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牛棚日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11页）“四壁都有各人子女写的大字报”，可见当时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之举真成了一种“时代潮流”。

作家严文井回忆：“我的女儿们也‘造’了我的‘反’。‘运动’开始不久，就联名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的修正主义罪状，其中有条：养花和养猫。”一天，他从关押地回家，看到“方桌上一张大纸条，上面写着：‘修正主义老爷，我把你的猫都送走了。’下面没有署名，可是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女儿的新的‘造反’行动。”（严文井《我相信……》，载《东方纪事》1989年第2期）

这类幼稚的“划清界限”行动，还有的是不给父母做事了。艾晓明回忆她父亲被揪出来的第二天，她下楼去食堂买饭时，两个学生叫住她说：艾仁宽来了，你跟他说，不跟他买饭了。这时他爸正被两个学生押着走过来，她只好用爸听得见的声音说：艾仁宽，我不跟你买饭了。（艾晓明《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52页）学者刘自立也回忆，他父亲刘克林（中宣部国际处干部，“九评”写作组成员，文革初期自杀）被批判时，“小妹本来给他从食堂买饭，以后

为‘划清界限’也拒绝买饭了。”（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1949年以后）——一生都在波涛中》下，自印书第500页）看来，“不帮忙到食堂买饭”也成了孩子们与父母“划清界限”的一个重要表现。

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回忆，妻子萧珊1972年去世之前，他到医院去看望她。“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24页）

著名学者吴宓，文革中在西南师范学院被打成“反动权威”、“反革命”，饱受折磨，在1969年5月9日的批斗大会上。吴宓被左右两边揪他的人抓着快跑中突然恶意放手，致使他栽倒在食堂的砖地上，扭折了左腿。1971年5月4日，他拖着病残之身，被学校“派遣”到梁平县乡间，住在公路旁的工棚中。这年6月他的右眼又因白内障全瞎了。就在这样孤苦无助的境况中，他于1972年5月写给亡妻老家亲戚的一封信中欲哭无泪地诉说：“宓有三女，皆不通音问。长女且公开宣布‘和宓断绝父女关系’（是1971年6月的事）……”（《吴宓先生给邹名璋侄的信》，《红岩》文学双月刊1998年第四期）

“划清界限”有时是很无奈的。著名学者童书业之女童教英回忆了这样一件凄怆的往事：一天晚上，在大学校园里文史楼和家属宿舍之间的一片小树林前召开了批判会，“这小树林小到只有二十几行树，却是校区到家属区的必由之路，走的人多了，小树林间小路纵横。我已不记得那天晚上排成一排挨斗的是哪些人了，只是看到瘦弱的父亲始终低头站在那里，待到斗完，他抬起头来茫然四顾，在原地转来转去，一时竟找不到回家之路，我不敢上前扶他回去，怕给我们父女招来更多的屈辱，只能望着父亲找到路往回走，身影从我眼中消失为止。”（童教英《在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306页）

当中央文革成员林杰被打成“五一六”抓起来后，其妻王乃英就在《红旗》杂志编辑部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事实，并表态说：“假如林杰同志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状，我一定坚决和他严格划清界限，

和大家一起积极批判他，把他打倒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第一版 237 页）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未使她免遭不幸，最后她在强大的“专政”压力下仍然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

家庭成员“划清界限”的事例中，最可叹的是董必武送子入狱。董必武当时身为国家副主席，在中共党内属于“元老”（连毛泽东也得尊称他为董老）。但是，在 1966 年底中央明确宣布以高干子女为主的首都红卫兵“联动”、“西纠”等是“反动组织”后，董必武也“奉命”（不知是谁的命令）被迫要求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董良翻投案自首入狱。据董良翻回忆：“1966 年 12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他也没有问为什么。”董良翻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连公安局的接待人员都莫名其妙，只好让他先回去。直到 1967 年 1 月 4 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才又打来电话叫他去投案。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坐了第一次牢。以后他随同那批坐牢的高干子女们一起获释，他回忆说：“这批红卫兵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周燕**《**聚焦董必武后人**》，《**中华儿女**》2002 年第 2 期 42 页）在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罪名也“没有人解释原因”的情况下，只为一个“中央通知”，堂堂国家副主席就得与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划清界限”，要求其自动投案入狱而不敢为其作任何辩解。这与周恩来亲自批示将自己的胞弟周恩寿（周同宇）逮捕入狱相比，岂不是更加可悲也更加可笑吗？因周恩寿当时毕竟还有个被江青要求追究的“反革命聚餐会”的莫须有罪名（**参见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亲人间的“揭发”

“划清界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揭发。只有进行揭发，才能证明是真正的“划清界限”。不过，亲人间的这种被迫的“揭发”一般都是避重就轻的，言不由衷的（当年小报上发表的一些名人、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所写的揭发材料多半如此）。也有的揭发是言不及义无关痛痒的，特别是一些被迫写揭发材料的小孩子，

他们本身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值得揭发的问题，如艾晓明回忆她被迫写的揭发父亲的大字报，揭发的是“艾仁宽”（不称“我爸”）在家对我们不耐心教育，打我们，军阀作风，“我举不出我爸反革命的事实，更甭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说破天我爸顶多也就是反我妈、我和我弟，除了发脾气打我们，我都挑不出他别的坏处。”

（艾晓明《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33页）

对重大原则问题的揭发就必须是对亲人的政治问题有所了解并且“革命觉悟”较高，或所受压力极大才行了，如前述刘少奇之女刘涛对刘少奇的揭发。更有甚者，据王力回忆：“陶铸的亲哥哥揭露陶铸是叛徒，因此毛主席同意了打倒刘邓陶的口号，而且定为敌我矛盾。”（《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 262 页）这个揭发被认为是捅了陶铸“致命一刀”。

另一个影响极为恶劣的揭发，是文革初期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被女儿揭发“乱伦”。在李范五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后，为了将其搞臭，按惯例还得找到其“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做文章。想要打倒李范五的省委领导干部伙同造反派，三番五次找李范五的大女儿谈话，并事先写好了诬指李范五“乱伦”的材料让她签字，她不肯签，最后给她指出两条路：1、签名揭发父亲乱伦立即可以让她参军；2、不签名就按“黑帮”子女下放农村劳改。在这种情况下，她违心签了名。女儿的这个“揭发”在群众批判大会上一经公布，自然引起群情激愤，那幅由记者李振盛拍摄的李范五被强行剃阴阳头的历史照片，就是在那时拍下来的。这件事使李范五及家人与他这个女儿的关系彻底破裂，李范五后来还立下遗嘱，不认这个女儿，自己死后也不让这个女儿来参加葬礼。此事在李家两代（甚至可能三代）人的心中烙下的伤口，是很难愈合的。

不过，在“划清界限”的大气候中，也有一些“顽固不化”的人，特别是平民中缺乏“革命信仰”的人，他们往往按照“传统观念”和生活常识，拒绝跟风行事。宁愿忍受痛苦和屈辱，也决不昧着良心与亲人“划清界限”。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教授的妻子邹莲舫，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敬佩的女性。据当时与朱东润一起作为“牛鬼蛇神”被监督劳动的章培恒回忆：“‘文革’一开始，朱先生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吃了不少苦。到第二年，校园里忽然贴出了朱师母写的一张大字报，为朱先生声辩，要求‘解放’朱先生。这在

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被揪出来的人的家属，觉悟高的，不但公开宣布划清界限，甚至还写很有分量的揭发材料；觉悟低的，也会承认对自己亲人的审查、批斗是对他（她）的挽救，很有必要。朱师母的这种做法，既使人诧异于她的天真，又令人敬佩她的勇烈。”（朱东润《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版，章培恒《前言》3 页）但是，邹莲舫却因丈夫朱东润的所谓“问题”而在家属区遭到反复批斗，后来被逼着每天带病扫街，她不堪折磨，含恨自杀身亡。

亲人间的敌视：从政治到感情

在家庭成员之间“划清界限”，普遍是出于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为了表示在政治上站稳了“革命立场”，或为了不受政治上的牵连影响，在严酷的时代氛围中不得已而做出“站到党和毛主席一边”的表示。许多人在表面上“划清界限”之后，感情上仍然与受到批判处分的亲人保持着联系或暗中的关怀、思念。然而，在一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被政治所操控，政治因素很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中的感情。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上的分野，一旦发展到情感方面，就会成为亲人间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决裂。当年像章含之与前夫洪君彦的分手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作家周而复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后，其歌颂上海“三反五反”运动的“主旋律”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被打成“大毒草”，他的妻子便出于“站稳革命立场”的原因与他“划清界限”，坚决要与他离婚。据周而复回忆，1973 年 8 月，他终于获得专案组准许，解除了长期的“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可以回家了。他回到了早已不是自己的“家”的家，原来五间一套的住房，已在他被押赴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后，被前妻主动退掉了三间。退房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告诉她：高级干部的问题未做结论前，待遇不变。劝她不要退，现在退房容易，将来再要房子就困难了。但“她认为已经‘完蛋’的人，还有什么‘将来’呢？坚决退掉。”连公家给周而复配备的书桌、沙发、椅子等都一齐退掉。周而复回来后只得到旧货店去另买一张书桌。“从‘五七’干校穿回来的衣服，既旧又脏，需要洗澡换身衣服。我打开衣箱一看：过去出国访问做的西装少了，问她那套灰色西装怎么没有了？放在什么地方？她说：‘我改了女式服装，你这一辈子还想穿西装吗？别作梦了！’……在她眼里，我注定完蛋了，一辈子完蛋了，彻底完

蛋了，连穿西装的资格也没有了，还谈其他什么哩！”她甚至还对周而复在京期间的活动进行盯梢、监视，向有关方面汇报。（周而复《往事回首录》，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4期129—134页）如此的决绝，真是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著名学者顾准的家庭悲剧更是时代的典型。顾准在文革前夕被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妻子汪璧被迫与他商定协议离婚（双方组织均未批准），妻子作出的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子女们不在政治上受到牵连影响。但是子女们却真正从行动上和思想感情上与父亲“断绝关系”，实行“彻底决裂”。文革中，顾准经历了奴役式的劳动改造和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孤独地承受着苦难。他的母亲与三妹和妹夫住在一起，妹夫施义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坚决不准他与母亲见面。他九十高龄的母亲只能通过六子陈敏之悄悄表示对顾准（顾是她的五子）的关心。顾准的子女们则对他敌视到憎恨的程度（因他们已视父亲为“阶级敌人”，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1969年底，顾准要随工作单位经济研究所下放河南息县，离京前他两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见妻子一面，这时“组织上”才不得不向他通报了其妻已在1968年4月自杀的消息。他要求与在京的孩子们见见面，组织上同意了，但却被孩子们拒绝了。1974年11月，顾准病重住院，自知来日无多，提出想见见孩子，顾准的六弟陈敏之给顾准在京的子女写了言辞恳切的长信，并分别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去医院看望父亲，但孩子们仍然拒绝与父亲见面。顾准希望他的幼子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借此沟通感情和思想，而重之给六叔陈敏之的信中却坚定地表示不会回来，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不认为是过分。”当顾准知道重之不会来时，他已经垂危的病情立刻恶化了。（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丁东、陈敏之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390页）

文革结束后，顾准的子女对当年的行为都追悔莫及。顾准的幼子重之写道：“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切所留下的痛楚，将永远刻在心上，今生今世也永不能平复了。”并表示他将“永远怀着负疚和苛责自己的心情向上。”（同上，

391 页) 顾准的大女儿反思道:“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 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 却长期视为殊途? ……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准则, 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 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 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陈敏之《顾准的最后十年》, 顾准著,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383 页)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破坏, 只是十年社会大动乱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编读往来】

[一、杜钧福来信谈本刊质量:](#)

关于贵刊质量问题, 我感觉, 贵刊的存在就是胜利。至于质量, 主要是要有新材料或新观点, 将散见材料整理也是需要的, 而不管来源。现在官方虽严格控制有关信息, 但是由于网络的发达, 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中逐渐透露出真相。贵刊是大有可为的。

[二、丁凯文为上期《读〈林彪日记〉》一文提供视频佐证:](#)

笔者与司马清扬在上期《记忆》上发表了《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一文, 其中质疑了原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的所谓“林彪在‘五一’天安门城楼上故意迟到和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的回忆。一位热心的读者随后在我们的网站(“林彪·军队·文革”)上贴出了一个网页的链接和部分视频资料。这个视频就是 197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晚的真实记录片, 片长 26 分 26 秒。该片的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该记录片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

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记录了 1970 年“五一”节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行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全过程。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率先走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则紧随毛泽东身后，身穿军大衣，手摇一本《毛主席语录》，登上天安门时还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外宾握手，并与毛泽东一起入座。林彪的表情也并非如杜修贤所言的“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影片显示林彪入座后与身边的人寒暄并露出微笑的面容。天安门城楼的这段影片中至少有三处林彪的镜头，林彪的表情看上去是愉快的。这段视频无可争议地证实杜修贤的所谓林彪因吸食毒品而故意迟到说乃子虚乌有的编造。杜修贤大段大段描写出来的当时的场景——诸如周恩来如何焦急等待的种种举止等更是精心编织出来的谎言。从实证和逻辑的角度来看，杜修贤的回忆已经不具任何可信的价值。事实上杜修贤自己否定了自己，杜修贤前面编织的谎言目的就是为了引出后面的林彪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的说法。该记录片虽然并未显示林彪是何时离开天安门城楼的，但是通过前面这段可靠的视频，我们可以推断林彪不可能对毛“不辞而别”。我们应该感谢电脑、互联网这些现代高科技，没有这些高科技，我们依然会被杜修贤的这些似是而非的伪作所蒙骗。

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网上观看这段视频：

http://v.ku6.com/show/9WGHibnw_tc5C7e_.html

还可见：<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f7IB0RLCQmc/>

三、上期《256 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一文的作者于鹏飞来信指出：

文中“因为据王维国长子王大章讲，就在 9.13 之后没几天他就听说……”一句，应为“因为据王维国长子王大章讲，他后来听说，就在 9.13 之后没几天……”

[四、读者蓝岭来信就上期于鹏飞《256 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一文](#)中提及“技侦八团”侦听到飞机“发动机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等，以佐证飞机是在蒙古被击落的，提出了不同意见：

据了解，事实并非如此。以下为涉及该团的几个历史细节。

1、据空军有关历史资料，于文中的“技侦八团”，当时的正式番号为空军技术勤务第八团，简称技勤八团。该团自 1969 年 12 月在山西大同成立之日起，即归军部亦驻大同的空军第十军建制领导，1976 年 6 月，改属北京军区空军领导。从 1969 年 12 月至文革结束，技勤八团都不归军委空军情报部直接指挥。

2、据“九一三”当天在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值班的一位知情者透露：9 月 13 日凌晨技勤八团侦收到的情报显示，蒙军雷达的确侦测到了 256 号飞机进入蒙古领空，但在蒙古军方尚未来得及实施阻止其继续飞行的措施前，目标即已消失，仅此而已。

3、有关“目标消失”的情报，并不能直接判断为目标坠毁。承前所述，技勤八团既没有侦收到蒙、苏军方对 256 号飞机有何应对措施的情报，更没有侦收到诸如“发动机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一类的情报。

4、技勤八团所获情报，按规定同时上报空十军司令部、北空司令部、军委空军司令部及总参。有关 256 飞机的情报，并没有亦不可能在任何一级受到截留。旁证是技勤八团的历史资料亦称：“1971 年 9 月准确侦收破译了……的情况，在关键时刻为党中央、毛主席提供了可靠情报，多次受到空军、总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虽然这些话有夸大其功劳的成份）。

5、于文称“这些情报从此就像没有出现过一样”与其下文“李（指李德生）对昨晚空军情报部的工作印象深刻，非常满意，夸奖贺：‘你这个情报真厉害！’是自相矛盾的。

6、“九一三”后空军组成的专家组完全有条件参考和利用技勤八团的情报。事实上是这些有限的情报对分析坠机原因并没有直接的帮助,而并非如于文所说空军专家组对这些情报“未曾加以考虑”。

五、读者裘卣来信,对今年第二十六期余汝信文所用语气提出商榷:

贵刊今年第二十六期余汝信文中,对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只是觉得其中指责阎明复的地方用语可以更客气一点,因阎写出此文也是为了给澄清文革史实添砖而非其他。在目前情况下,能多一些各方面的人来做澄清文革史实的事不是更好?

六、作者司马清扬就上期与丁凯文合写的《林彪日记》书评,提出两处修订:

1、原文所讲“林彪接见的邓华等原四野几个高级将领的回国也是在 1951 年 6 月份”,应为“林彪接见的十三兵团部分师级领导的回国也是在 1951 年 6 月份”。

2、原文所讲“1939 年 9 月,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此日期不对,实为 1940 年 9 月。